



近代 甘宁青

钟银梅◎著

皮毛贸易与畜牧经济开发研究
JINDAI GAN NING QING
Pimao Maoyi yu Xumu Jingji Kaifa Yanjiu



宁夏人民出版社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 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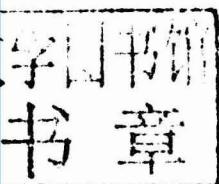
主编 / 张进海

近代甘宁青

皮毛贸易与畜牧经济开发研究

JINDAI GAN NING QING
Pimaoyi Yu Xumu Jingji Kaifa Yanjiu

钟银梅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甘宁青皮毛贸易与畜牧经济开发研究 / 钟银梅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12
(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库 / 张进海主编)
ISBN 978-7-227-04598-4
I . ①近 … II . ①钟 … III . ①毛皮—商业史—研究—西北地
区—近代②畜牧业经济—经济史—研究—西北地区—近代
IV . ①F724.725②F32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7465 号

近代甘宁青皮毛贸易与畜牧经济开发研究

(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库)

钟银梅 著

责任编辑 周淑芸

封面设计 陈冰融 林秋云

责任印制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00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5752 印数 1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598-4/F·339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 论

区域经济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体。与此相应，区域开发也是一项内涵丰富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多模式、多渠道和多领域。在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从历史的角度去审视西北地区的优势资源和优势产业，展开对历史时期西北畜牧经济开发的研究，将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甘宁青三省相邻相界，自然地理、人文因素以及政治经济环境大体相同或相近，属于同一经济区域。研究近代以来甘宁青区域的畜牧经济开发，能够为甘宁青区域经济社会快速持久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与此同时，皮毛贸易是近代以来西北地区富俱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新兴经济现象，甘宁青三省的皮毛贸易因物流方向趋于一致，可视为西北皮毛贸易中一个重要的整体单元。它曾一度促使甘宁青区域经济走上外向型的发展道路，并促使甘宁青区域内一批新的商业城镇得以产生，一些新兴行业兴旺一时，进而使这里的民族和社会开始出现诸多新鲜进步气象。因而，皮毛贸易与近代甘宁青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是甘宁青区域畜牧经济开发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深入研究近代甘宁青皮毛贸易及其在畜牧经济开发，乃至在区域经济开发中的作用，可以为新时期开发建设甘宁青的伟大实践中探寻如何有效发挥本地区地域优势、资源优势及民族优势，开创一条适合本地区快速持久发展的正确之路，提供有益的思路与参考。

学术界对于皮毛贸易问题的研究早已有之。民国时期关于西北开

发及建设的各类杂志、西北考察、社会调查日记、边疆史地研究著作及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中，多有关于皮毛贸易的数据统计和情况分析，可惜资料庞杂、分布零散，且所统计的数据出入较大，真伪性不易甄别，致使近代皮毛贸易的基本面目呈纷杂不清的状态。现代学者在研究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及民族关系过程中，对皮毛贸易也多有关注，目前公开发表的与皮毛贸易相关的文章已不下二三十篇，如《近代甘青川康藏区与内地贸易的回族中间商》《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及《青藏高原地区藏族和穆斯林群体的互动关系》等，学者们分别从某一阶段、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角度撰文，就皮毛贸易的局部性问题加以研究。此外一些专著(如《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等)，其部分章节中对皮毛贸易也间有涉及，但因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这些著作对近代皮毛贸易均未作深入综合的整体性探讨。黄正林教授的《近代西北皮毛产地及流通市场研究》是目前以近代西北皮毛贸易为研究主体的最新成果，也仅限于对皮毛贸易本身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探究。与此同时，近年来，学术界对近代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问题多有关注，相关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胜枚举。它们或给予宏观评介，如李宗植撰《近代西北开发特点述论》(载于《开发研究》1994年第5期)和赵珍撰《近代西北开发的理论构想和实践反差评估》(载于《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等；或侧重农业、工矿业、商业、交通及金融等某一方面分别进行专题研究，如张奇、杨红伟撰《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朱立芸撰《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简论》(载于《开发研究》2000年第5期)及赵俊撰《抗日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北金融问题研究》(西北大学200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等。相关的专著也多有问世，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王致中、魏丽英主编的《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下册)(1996年三秦出版社版)和魏永理主编的《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199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版)，前者从西北人口的波动、新生产力的移植、近代工业的发展、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农村生产关系的嬗变等方面阐述了近代以来西北社会经济的开发与发展，是一部关于西北经济研究的

力作；后者就近代以来农林牧业、手工业、工矿业、贸易、交通邮电业、金融业等各行业领域的开发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可谓目前关于近代西北经济开发的代表性著作。

如前所述，皮毛贸易和西北开发问题得到了学术界的长期关注和卓有成效的研究，也已取得众多可喜成就，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综观已问世的众多成果，尤其是关于皮毛贸易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还停留在局部性研究的层面上，表现为成果以零散发表的论文和部分著作中的个别章节为主，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而且，所有这些成果，不论是研究皮毛贸易问题，还是研究西北开发问题，再或是对两个问题均有涉及，无一例外地都是将皮毛贸易和近代西北开发作为两个不同的研究主体分别加以探讨，而将二者联系起来做深入综合研究的工作还未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和开展。与此相应，在甘宁青区域社会的广阔视角下，以皮毛贸易为研究主体，以区域经济开发为指归，进行综合性深入探究的成果尚未出现。因此，本课题研究着眼于畜牧经济开发的广义范畴，对官方有意识的主观开发和民间无意识的客观开发加以统筹考虑，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近代皮毛贸易与甘宁青区域畜牧经济开发之间存在客观联系的角度出发，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以廓清皮毛贸易长期以来纷乱复杂的历史概貌为基本任务，进而在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之下，着力对甘宁青区域经济开发，尤其是包括皮毛贸易在内的畜牧经济开发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较深入的尝试性探究，从而首次突破了学术界对于皮毛贸易问题以往研究的局限，延伸和拓展了西北经济开发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对西北经济史研究将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本课题属于历史学和经济学、民族学等多学科交叉性综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利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在重视文献记载的基础上，注意甄别史料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由于近代甘宁青区域畜牧经济开发是一个包含多途径、多阶段的复杂动态过程，因此，纵向比较、横向联系的方法也是

本课题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换言之，本课题以区域经济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为主，辅以民族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纵向比较、横向联系以及史论结合的形式从多视角展开分析和探讨。在研究思路上，本课题立足于皮毛贸易是近代甘宁青畜牧资源开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客观事实，把皮毛贸易置于甘宁青近代社会发展与区域经济开发的广阔领域，通过对各种零散资料的抓梳、整理，理清近代甘宁青皮毛贸易发展的基本脉络，并以探究其兴起原因、发展概况、特点、趋势及作用等问题为切入点，通过与其同时开展的官方开发活动进行横向联系和纵向比较，展开对近代甘宁青区域经济开发途径等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旨在通过对近代甘宁青畜牧资源开发这一典型个案的研究，尝试性地探讨资源性地区合理利用资源开发地方经济的正确有效途径，以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在于对皮毛贸易本身和近代甘宁青官方开发畜牧资源活动的探究，它们将是本课题立论的前提和基础，而难点则不仅在于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分析与甄别，从繁杂零乱的各类资料中梳理出本课题可利用的真实可信的资料，而且在于透过具体的经济、民族乃至社会现象发现隐含其中的关键性问题，并上升为理论认识，形成对于区域经济开发有效途径深入探讨的理论构架，这两方面都增加了本课题研究任务的艰巨程度。

在研究内容上，本课题以近代甘宁青畜牧资源开发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就近代甘宁青民间和官方所进行的区域畜牧经济发展历程及内容进行了分别阐述，并在廓清各自基本面貌的前提下，对二者进行了比较性分析，从而探寻出某些隐含其中的规律和启示。具体而言，本书内容分为十章，前八章以时间为序，分别就近代甘宁青民间和官方民间畜牧资源开发活动进行纵向研究。其中对于民间开发畜牧资源活动——皮毛贸易，从清末发轫到民国早期的高潮，再到民国后期的逆转与衰落，逐期逐段地加以概貌廓清性研究，并置之于近代甘宁青区域社会的时空背景下，围绕其本身存在的诸多特点、一度所产生的显著效果以及影响和制约其发展变化的各种具体因素展开综合分析；对

于官方开发畜牧资源活动，则分为清末、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及抗战期间几个主要阶段加以阐明，就其开发设想、实践及其所产生的效果等方面逐一加以阐述。本书后两章是在上述纵向研究的基础上，对来自民间和官方两种途径的开发甘宁青畜牧经济的实践进行横向比较性研究。通过联系和对比，对两种途径开发实践的成功与失败产生新认识，并对两种途径之间应有的合理关系进行探讨，进而以此为基础，放眼甘宁青区域经济开发全局，对甘宁青区域经济发展中皮毛贸易在发挥地域、资源、民族优势方面的作用以及回、藏、蒙等民族在贸易活动中的角色与关系进行深入探究，从而得出有益于探寻甘宁青区域在和谐稳定的前提下长期持续快速发展合理答案的思考和启示。

本课题研究的时间断限为近代，即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期间的百余年。本课题所涉及的空间概念基本上依照近代的行政区划，现属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和额济纳两旗以及磴口县，因当时属于宁夏省，故而也包含在本课题研究的空间范围之内。此外，另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本课题所及之“皮毛”内涵广泛，甘宁青区域内所产家畜和野生动物的皮、毛及其肠、鬃等附产品均在此之列。其中，以各类羊皮、羊毛比重最大。二、本课题所及之“皮毛贸易”，主要侧重于由甘宁青区域向外界输出的贸易额，尤其是向国外出口的贸易额，对区域内部各地间的皮毛产品交换额不作单独考虑。而且，在甘宁青向外输出的皮毛贸易额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一定量由邻近的蒙古和西藏等地输入到此，又以此为中转，继而向东输出的贸易份额，为研究方便，权且作为贸易整体的一部分而不予单独析出。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001
第一章 近代甘宁青区域的畜牧经济环境	
第一节 甘宁青三省的行政建制与民族分布	001
第二节 甘宁青区域自然环境与经济形态	011
第三节 甘宁青区域的畜牧资源优势	017
第二章 清末甘宁青民间大规模开发畜牧资源之发轫	
第一节 清末甘宁青民间皮毛贸易的兴起	023
第二节 甘宁青民间皮毛贸易兴起之缘由	027
第三章 民国早期民间开发甘宁青畜牧资源之高潮	
第一节 民间皮毛贸易的规模与数量	034
第二节 民间皮毛贸易的路线和市场体系	040
第四章 民间开发甘宁青畜牧资源的作用与效果	
第一节 资源优势和民族优势空前发挥	049
第二节 相关行业链及其他商贸形式出现与发展	062
第三节 甘宁青社会逐渐趋向近代化	075
第五章 民间开发甘宁青畜牧资源的特点与制约性因素	
第一节 甘宁青民间皮毛贸易的主要特点	084
第二节 甘宁青民间皮毛贸易发展中的制约性因素	094
第六章 清末民初社会上层开发甘宁青畜牧资源的尝试	
第一节 清末社会上层对甘宁青畜牧资源的开发利用	107

第二节 民国初年社会上层全面开发甘宁青畜牧资源的 酝酿与构想	115
第七章 国民政府组织开发甘宁青畜牧资源的实践及绩效	
第一节 国民政府组织西北经济开发的时代背景	120
第二节 社会各界对开发甘宁青畜牧资源的思考与酝酿	125
第三节 国民政府组织开发甘宁青畜牧资源的实践	134
第四节 国民政府时期甘宁青畜牧资源开发之绩效	145
第八章 政府干预和控制下甘宁青畜牧资源民间开发的终结	
第一节 政治环境与贸易政策的转变	153
第二节 官方垄断性皮毛贸易的规模化开展	156
第三节 地方军阀对民间皮毛生产与经营的破坏	159
第九章 甘宁青畜牧资源民间开发与官方开发二律背反现象之剖析	
第一节 民间开发模式的得与失	165
第二节 官方开发模式的成功与失败	171
第三节 两种开发模式之间的关系	180
第十章 历史带来的思考与启示	
第一节 由近代甘宁青畜牧资源开发史引发的思考	184
第二节 对甘宁青区域经济开发正确途径的有益探讨	189
附录	
皮毛贸易史研究资料（1840～2009）	195
参考书目	217
后记	219

第一章 近代甘宁青区域的 畜牧经济环境

根据区域经济学理论，区域经济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民族分布、生产技术、社会经济以及历史传统等众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的综合体，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而它们所产生的合力又决定着区域经济环境的优劣。相邻相界，在自然地理、人文因素以及政治经济环境方面大体相同或相近的甘宁青三省，因符合学术界关于社会经济区域中“地域组合”^①的概念而常被视为同一经济区域。近代以来，甘宁青三省在行政建制上日臻稳定、完备，而其自然地理环境、民族分布及资源储备等方面的诸多特点，同时也孕育着甘宁青总体区域经济环境的特殊性。

第一节 甘宁青三省的行政建制与民族分布

从理论上讲，区域行政建制是区域经济环境在政治上的保障，民族分布状况又是形成和影响区域经济环境不可避免的人文因素。因而，我们首先对这两方面加以考察。近代以来，甘宁青三省在行政建制上产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在民族分布格局上也发生着一些重大改变。

一、近代甘宁青三省的行政建制变化

经过千余年来中央王朝版图的不断扩张，近代以来，甘宁青三省

^① 杨国桢：《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探索》，见：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第38页。

区不仅被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范围，而且在行政建制上也得到了不断地细化与完善。

清以前乃至清初的较长历史时期，中央王朝对陕甘地区始终实行合并治理，甘宁青区域还没有单独的省级建制，今甘肃兰州以东，宁夏固原、隆德与青海部分地区归陕西布政使司所辖，甘肃河西及青海西宁地区归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所辖；康熙三年（1664年），陕西布政使又分为左右布政使，以右布政使驻巩昌，下辖庆阳、平凉、巩昌、临洮四府，甘肃其余地区仍属陕西都指挥使司；康熙六年（1667年）改陕西右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次年又改为甘肃布政使司，治地从巩昌移向兰州，甘肃正式建省。

此后直到鸦片战争前，甘肃省东接今陕西，南至今四川，西南至今青海，北至今内蒙古阿拉善、额济纳二旗，辖境除现今的甘肃外，还包括今宁夏、青海以及新疆乌鲁木齐以东的镇西府、迪化州，而青海的果洛地区属于四川省，西部牧区则由钦差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理。进入18世纪，清政府在青海粉碎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设青海办事大臣于西宁，统辖范围包括今青海玉树、海西两州全部及海南、海北、黄南三州的纯牧业区，从而使青海完全归入清王朝的统治范围。

鸦片战争之后，在英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策动下，阿古柏在新疆发动叛乱，左宗棠进兵粉碎阿古柏叛乱并上书建议新疆建省，清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改建行省，甘新两省在原来的基础上实行分开治理，镇西府、迪化州划归新疆，而甘宁青仍为一体，统括在当时甘肃省行政区划之内。

甘新分治后的甘肃省统领八府、六州、一厅，即兰州府、巩昌府、平凉府、庆阳府、宁夏府、西宁府、凉州府、甘州府8府，安西州、秦州、阶州、肃州、泾州、固原州6个直隶州以及化平川1个直隶厅。^①后又改府为道，全省共下辖47个县、6个散州、8个散厅，

^① 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第453页。

分属七道而统辖于巡府，已初步形成了建制较为完备的行政体系。

民国初年，省级建制仍沿袭清末，甘宁青仍为一体。直到民国 16 年（1927 年）后，出于形势需要，国民政府才着手对甘宁青地区的行政建制加以逐步调整。民国 17 年（1928 年），国民政府先后从甘肃省析出西宁道和宁夏道属地，9 月 5 日，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第 153 次会议通过了甘肃分治案，决议新建青海省，治设西宁。10 月 17 日，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第 157 次会议又决议将甘肃省西宁道属之西宁、大通、乐都、循化、巴燕、丹噶尔、贵德等地划归青海省管辖；同时，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第 159 次会议决议将甘肃省宁夏道旧属八县（即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中卫县、灵武县、金积县、盐池县和平远县）和原宁夏护军使辖地阿拉善、额济纳旗合并新建为宁夏省。^①10 月 19 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以国民政府命令行文，公布设置宁夏省。^②民国 18 年（1929 年）元月，青海省、宁夏省均告正式成立。自此，甘宁青三省的行政区划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甘宁青三省的内部行政建制自民国初年开始也在逐步走向完善。这里仅以宁夏省为例，民国成立后，宁夏府改为朔方道，后又改称宁夏道，灵州改为灵武县，宁夏厅改为金积县，花马池分州改为盐池县，甘肃固原州属之平远县划归宁夏，改称镇戎县（后又改称豫旺县），并置宁夏护军使，辖西套蒙古两旗。民国 18 年（1929 年），宁夏省府成立，各辖地合并归入宁夏省。新成立的宁夏省共领 9 县 2 旗，即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中卫县、灵武县、金积县、盐池县、豫旺县（原镇戎县）^③、磴口县^④和阿拉善额鲁特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民国 23 年（1934 年）元旦，又分中卫胜金关以东之地设中宁县。民国 27 年（1938 年）改豫旺为同心县，民国 29 年（1940 年）改宁夏为贺兰县，并添置永宁、惠农两县，民国 30 年（1941 年）

^① 叶祖灏：《宁夏纪要》，南京正论出版社，民国 36 年（1947 年）。

^② (宁)《国民政府公报》第 2 号，国民政府文官处，1928 年 12 月 27 日。

^③ 国民政府秘书处第 222 号公函宣布改镇戎县为豫旺县，自 192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④ 1926 年 12 月冯玉祥下令在磴口设县，1929 年 1 月 30 日南京国民政府第 197 号指令正式认可，并将其划归宁夏省管辖。

置陶东县。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宁夏全省共辖 13 个县、1 个市、设治局 2 个，另有两个蒙旗。^①

二、近代甘宁青区域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

众所周知，甘宁青三省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到清时，甘宁青区域的现今各民族主体均已形成，汉、回、藏、蒙、撒拉、东乡、土、裕固等众多民族长期居住在这里。近代以来，在行政建制不断完善的同时，甘宁青三省各民族的分布状况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蒙藏两族分布格局的长期变迁与基本确定

从明清之际顾始汗率领和硕特蒙古部落由新疆南徙青藏开始，蒙藏两族长期争夺牧居地的序幕就此拉开。此后，和硕特蒙古部众陆续移牧于青海并一度统治了青藏高原，顾始汗一度成为整个藏区的最高统治者，统治了西藏、青海和西套（阿拉善）。在和硕特蒙古的影响下，土尔扈特和辉特部、准噶尔及喀尔喀部等其他蒙古部众也纷纷开始入据甘宁青，青海湖环湖地区一时间成为蒙古族游牧的主要势力范围。

大批蒙古人的移入给甘宁青地区的藏族部落带来了较大影响，原驻牧于青海湖周围及黄河两岸的藏族部落大部分被迫迁往黄河南岸即“河南”（今青海循化、同仁、尖扎、贵德等地）一带游牧，形成了蒙藏二族以黄河为界、“南番北蒙”的分布格局，即蒙古族多居黄河之北（即黄河流经的今贵德、循化以北和青海湖、湟水以南地区），藏族居黄河之南。后来，随着人口的发展，和硕特蒙古又将牧地逐渐向东南一带拓展，至康熙年间，进入黄河南岸及河曲地区，实际势力范围接近或到达关西布隆吉尔、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洮州以及四川喀木与云南中甸一带。与此同时，清廷划定“自宁夏之玉泉营之贺兰山阴，自甘州之镇番口至额济纳河，俱以离边六十里为界”^②为西套厄鲁特的牧地范围，并在这里编设了佐领组旗，名为阿

^① 叶祖灏：《宁夏纪要》，正论出版社，民国 36 年（1947 年），第 3 页。

^②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拉善和硕特旗，宁夏边外阿拉善之西的额济纳地区则由卫拉特蒙古系属旧土尔扈特部长期驻牧，乾隆年间清廷在这里正式设立额济纳土尔扈特旗。据估计，这时西藏、西套及青海境内分驻着 20 万以上的蒙古部众。^①蒙古人的大批迁入，使得许多藏族部落或远徙或成为蒙古贵族的属民，史籍载：“番民失其地，多远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为所役属。”^②久而久之，乃至不少藏民“但知有蒙古，不知有中国”。^③

这种局面自“罗卜藏丹津事件”之后才有所改变。雍正年间，清廷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限制青海蒙古势力发展的“抚番抑蒙”措施，在整顿黄教寺院、设立西宁办事大臣直接管辖蒙藏事务的同时，废除了和硕特蒙古在青海的统治地位，根据“宜分别游牧居住”的原则，在蒙古各部推行蒙旗制，将青海蒙古编为 29 旗，各旗旗长称札萨克，并设协领、副协领、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员，各旗之间划定地界，规定不得私占，不得逾越和私自往来，不得私相统属，同时改革青海蒙古旧有的会盟制度，明确规定各旗每年在西宁办事大臣主持监督下举行会盟和 3 年一次进京朝贡等制度。而在青海藏族部落中普遍推行较为松弛的千百户制，规定一千户委一千户长，每百户委一百户长，不足百户者设百长，千户之上又设一总千户统管，准予千百户世袭并赋予其征派服役、掌理诉讼等封建特权。

由此，蒙古族由盛而衰，藏族部落快速发展，蒙藏分布格局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嘉庆初年，由于无法抵御循化、贵德两厅所属藏族部落及果洛藏族的频繁攻掠，黄河以南的蒙古 5 旗被迫移往黄河以北驻牧，藏族大规模北迁活动从此开始。从乾嘉之际到咸丰八年（1858 年），“河南”藏族部落进行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复迁“河北”的大行动。在清廷多次干预和武力镇压下，咸丰九年（1859 年），这次大行动终于以刚察、汪什代海、千卜录、下拉安、揣子、完秀、都秀、

^① 莊一之：《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26 页。

^② 梁份：《秦边纪略》卷一《河州卫》，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③ 《西宁府新志》卷二十《武备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

他秀等“环海八族”藏族部落的形成而告结束。“环海八族”的形成基本上奠定了此后长期以来藏族环青海湖而居的分布格局，环青海湖的海北、海南二州，原属循化、贵德二厅的河曲地区以及玉树、果洛、甘肃甘南地区成为迄至今天藏族聚居的地方。此外，甘肃洮岷地区、青海东部及河西地区也属于藏族居住地，不过由于受到清初以来汉民大量迁入的影响，这里成为藏、汉、回等多民族错居杂处之所，到清末时已有相当一部分藏族融入汉族之中，或变成了亦藏亦汉的“嘉西番”（即汉化了的藏族）。^①

伴随着“河南”藏族迁牧“河北”活动的结束，蒙古族的分布也在变动中趋于稳定。清中叶以后受蒙藏民族势力消长的直接影响，蒙古族的人口大量减少，分布区域也在逐渐缩小。到清末，蒙古族在甘宁青主要分布于青海环湖（主要分布于今海西、海北二州）及河曲地区（即今青海“河南”蒙古）、祁连山西段山麓（即今甘肃肃北蒙古）及贺兰山阴阿拉善四块地区，这种分布格局至今保持未变。

（二）回族人口的大规模疏散与重聚

近代以来，回族人口及其分布也发生了重大变动。清初，随着社会生活和经济状况的进一步发展，西北地区回族人口进入了稳定快速的内部繁衍阶段，人口数量增长较快，人口分布范围也比较广泛。在西自洮河流域及河西走廊，东到渭河流域“八百里秦川”的广大地区，呈现沿黄河两岸和古丝绸之路北道交通线两个走向带状分布的明显态势。据《甘宁青史略》载，清乾嘉时期，甘肃全境（包括今宁夏和青海东部地区）回族的分布情况是：“其群居之处，西路之甘（今张掖）、凉（今武威）、肃（今酒泉）；西宁之西乐（今乐都）、互（今互助）、大（今大通）；南路之清水（今清水县）、徽县、秦州（今天水）；东路之平凉、固原、化平（今宁夏泾源）、海原；北路之宁夏（府）所属之宁夏县、宁朔县、中卫县、平罗县、宁灵（厅），皆与汉人错杂而居，惟河州最多，其种类亦最强。”^②据学者大致统计，到清

^① 秦永章：《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17页。

^②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副编）卷十二，兰州俊华印书馆，民国25年（1936年）。

代后期仅甘肃的回族人口就达 150 万之众。^①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回族社会成熟的经济与滞后的组织状态日益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回族步入了以民族起义为主要形式的争取组织化的艰难历程。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以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此次起义于同治元年（1862 年）在陕西关中地区首次爆发，之后起义的烽火迅速波及甘肃地区，并先后形成了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四个起义中心，历经 12 年，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 年）在清廷的残酷镇压下归于失败。

清末回族人民的起义斗争对西北回族人口及其分布产生了莫大影响。一方面，经过清军屡次残酷的屠杀和焚毁，起义后的西北地区显得格外荒凉凋敝，回族人口规模急剧萎缩。史载陕甘“汉回民人空亡大半”^②，陇东一带“兵燹之后，人物凋残”^③。据学者研究，在宁夏，回族人口由起义前的 80 余万减少到起义失败后的 23 万左右。^④回族人口大规模减少使得部分传统的回族聚居区域自行消失，如甘肃河西地区曾长期是回回人活动频繁和聚居的地区，而起义后这里的回族死散殆尽，从而出现了“自是甘、凉、安、肃一带无回民聚处”^⑤的局面，以后虽几经变迁，但终再未成为回族的聚居区。此外，甘肃的陇西城、秦安的莲花城等都曾是传统的回族聚居区，然而起义后城中已难寻穆斯林的踪影。另一方面，回民起义后清廷加强了对回族的防范，为图长治久安，以“涣其群、孤其势”为原则，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对陕甘回民进行了强制性的大批疏散和迁徙，使其原有的居住环境上的优势被完全剥夺，被迫生存于所谓“三边二梢”（即山边、河边、沙滩边和沟梢、渠梢）的荒僻地区，将关中一带的陕西回民强制安插在甘肃偏远地区，金积堡一带的回族两万余人移到化平川（今宁夏泾源）一带，固原的回族数千人安顿在平凉的大叉沟

^① 霍维洮：《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4 页。

^② 《平定关陇纪略》卷十三，见：白寿彝编：《回民起义》第 4 册，第 196 页。

^③ 《平定关陇纪略》卷八，见：白寿彝编：《回民起义》第 4 册，第 44 页。

^④ 丁国勇：《宁夏回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2 页。

^⑤ 《清史列传·左宗棠》，中华书局，1987 年。